

台湾义勇队家国情怀及抗战复土活动再探索

陈支平 陈波源

摘要：基于《台湾义勇队档案》及相关史料，本文对台湾义勇队的家国情怀与抗战贡献进行再探索。档案显示，台湾义勇队的家国情怀根植于深厚的历史、民族、精神与文化归属感，其奋斗目标始终是“保卫祖国、收复台湾”。档案也揭示了台湾义勇队为全民族抗战所做的系统性贡献，其工作不仅限于敌后武装行动，更涵盖了情报策反、组织与人才培养、文化与社会工作等多个层面，为抗战胜利与台湾光复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台湾义勇队的抗战史实，展现了台湾同胞与祖国大陆休戚与共的命运联结和强烈的民族认同感，有力地驳斥了旨在割裂两岸历史联系的“台独史观”，为理解台湾是中国一部分提供了重要历史参照。

关键词：台湾义勇队；李友邦；“台独史观”

作者简介：陈支平，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厦门大学国学院教授；陈波源，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K265.9; D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683 (2025) 05-0001-10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80 周年，也是台湾义勇队建队 84 周年。台湾义勇队是唯一一支由台湾同胞组成的武装抗日队伍，其抗战事迹可歌可泣。1998 年我和陈在正先生受台湾义勇队总队长李友邦夫人严秀峰女士委托，根据台湾义勇队战地出版物等资料，撰写了《李友邦与台胞抗日》一书，分别在大陆和台湾两地正式出版发行。2015 年严秀峰女士不幸逝世，易簷之际，交代哲嗣李力群先生把台湾义勇队未经公布的抗战档案复制赠送给我。值此抗战胜利暨台湾光复 80 周年之际，我们谨把这些档案整理分析，以期对台湾义勇队的家国情怀及抗战贡献，做一更为深入的探索。

一、《台湾义勇队档案》概述

《李友邦与台胞抗日》一书主要从宏观角度记述了李友邦从青少年时代的思想启蒙、投身国民革命，到组建并领导台湾义勇队在祖国大陆开展前敌医务、生产、对敌宣传和武装行动等工作，直至最终蒙冤遇害的人生历程。^[1]而《台湾义勇队档案》收录的主要是 1941 年至 1945 年间台湾义勇队的相关档案材料，共计 1546 份，内容详实、形式多样，是研究台湾义勇队及相关抗日活动不可多得的宝贵材料。

[1] 陈正平：《李友邦与台胞抗日》，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 年。另：该书由陈在正、陈支平合作撰写，署名陈正平。

档案文献类型丰富，包含：官方电文、内部训令、工作计划、会议纪要、个人陈情、干部与队员名册、考试答卷、年度 / 季度总结、预算表、谍报报告、宣传画报、标语口号、漫画壁报、报刊文稿、医务与宣导月报、剧团章程、慰问调查报告等。按其内容，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1. 组织建设与成员培养：包括年度与专项工作计划、干部与少年团训练计划、考核与选拔简则、招考卷、成员名录与履历等，详尽记录了队伍选拔、训练与管理过程。

2. 军事与谍报工作：包括策反等敌后活动、敌伪势力名单、谍报成果等情报，反映出台湾义勇队敌后工作的实际操作与对战局的深入参与。

3. 宣传与思想动员：包括《告台湾同胞书》、宣传标语、宣传刊物、壁报、漫画、剧团和报社建设方案等，集中体现了抵抗“奴化教育”、反击“台湾共管论”以及强化台胞民族认同等活动。

4. 战后接收与社会调查：包括“复土建设研究委员会”相关文件、厦门及鼓浪屿等地台胞生活状况的调查报告、社会救助计划、战后地方接收与秩序恢复的部署等，展现出台湾义勇队对于战后社会重建和台胞利益维护的现实关切。

档案真实记录了台湾义勇队从决策制定到基层运作的各个环节，系统地展现了台湾义勇队作为战时台胞组织团体的运作模式。因此，借助《台湾义勇队档案》，我们得以直接观察其战时工作的真实细节与决策过程，从而对其家国情怀与抗战行动进行更为细致的探讨。

二、李友邦将军与台湾义勇队的家国情怀

李友邦将军与台湾义勇队所体现的家国情怀，深刻反映了20世纪中叶中华民族在民族危机与社会变革中的集体心理图景。这种家国情怀根植于台胞对光复台湾和祖国统一的强烈渴望、对民族独立的执着信仰，以及对台湾与中国整体命运不可分割的历史认知中。在《台湾义勇队档案》的大量文献中，台湾的苦难与抗争被系统地置入中华民族整体抗争的语境中，成为抗战精神的缩影与民族复兴叙事的一部分。以下就历史层面、民族层面、精神层面以及文化层面四个维度，综合阐述档案中所见李友邦将军与台湾义勇队的家国情怀。

在历史层面，李友邦将军始终将自己与台湾的命运置于中华民族整体兴衰的历史脉络中。由于童年时曾经历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亡国奴般的不平等教育，李友邦深知台湾与祖国的联结，在其档案中反复出现如“虽台民，然祖国为怀，岂肯甘心奴隶？”、“（台湾）被日本割据为殖民地而来，深感煮豆燃豆萁之叹，期待收复解放、民族自由！”^[1]等表述，表现出台胞强烈的历史痛楚与家国联结意识。李友邦曾清晰地指出，台湾自被清廷割让以来，经历了“政治的压迫、经济的榨取以及奴隶的教育”，^[2]全岛台胞的苦难与抗争既是领土割让的耻辱，也是国家救亡图存历史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他在电令与训示中，将台湾与祖国大义紧密相连，多次提出“保卫祖国、收复台湾”的目标，并以“台湾义勇队乃为参加保卫祖国与收复台湾之军人家庭也”作为总纲，^[3]明确将台湾的收复纳入国家整体抗战建国的历史逻辑之中。台湾义勇队的

[1]《林竹钩签呈》，《台湾义勇队档案》，第13页。

[2]《台湾义勇总队宣传画报（图文）》，《台湾义勇队档案》，第62-64页。

[3]《台湾义勇队队规》（1941），《台湾义勇队档案》，第260-262页。

作战纲领指出，中国抗战不仅粉碎了日本“武装侵略的阴谋”，更使得台湾的收复成为对半个世纪日本侵略主义的历史“总结算”，象征着中华民族从苦难走向自立的历史转折。

事实上，这种将个体命运与中华民族整体历史统一起来的认知方式，并不仅仅存在于台湾义勇队或其他台湾革命团体，在台胞群体中也具有普遍性。例如，一封旅居汕头台胞的意见书生动表达了台胞对于割台的悲愤及对抗战胜利的渴盼：

台湾自清廷割让倭寇，经已五十年之久，其六百万台胞尝尽亡国之痛苦，诚非笔墨所能形容，凡我台胞莫不切齿痛恨。尤其祖国抗战以来，敌人施以残酷毒辣手段，更使台胞痛苦万状。台民期待祖国抗战胜利，以解放台胞，使台胞归怀祖国之心理亦甚炽烈〔烈〕。^[1]

即使国民政府部分官员因“敌产”问题对台胞态度傲慢冷漠，台胞在申诉书中依旧坚持“台胞亦国民之一，断无仇视为敌之理”。^[2]这一表态不仅表达了其对自身合法权利的维护，更体现出广大台胞对中国国民身份的认同，也说明台湾民众在集体心理层面与祖国形成命运共同体式的情感联结。

在民族层面，李友邦高度重视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在台湾社会的普及与认同，尤其关注日本殖民统治对台胞民族认同的冲击。档案中多次出现，台湾社会长期处于“奴化教育”之下，部分台胞民族意识淡薄、国家认同模糊，故必须通过系统的再教育恢复其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与情感归属。因此，李友邦在档案中多次强调民族观念之于祖国抗战的基础作用，要求台湾义勇队队员“彻底了解自身对于祖国应负之责任，对台湾革命应尽之义务”，^[3]并强调教育必须“使台胞认识中华民族五千年以来之光荣历史，确认‘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真义，发挥民族精神”。^[4]台湾义勇队在一份宣传提纲中鲜明地提出：“五十年中国国民革命的发展以对日抗战为依据。（甲）中国之国民革命以甲午为发轫点，国民革命的目标是恢复高丽的独立、收复台湾的失地。（乙）国民革命发展为对日抗战以五三事件、九一八事件、一二八事件与七七事件为其显著的进程，而恢复东三省的领土主权行政的完整为最后的目标。”^[5]

为了进一步强化国家和民族认同，李友邦尤其注重推动台湾青少年群体对中国地理、历史、民族、文化一体性的系统认知，并建立台湾义勇队少年团招收有志参与祖国革命的台湾青少年。通过该队将民族认同植入青年政治社会化过程，明确提出其宗旨为“提高台胞民族意识、吸收青年台胞参加本团”等工作任务。^[6]据统计，台湾义勇队少年团曾在漳州、厦门等地先后招收116名两岸青少年。一封台湾义勇队少年团的投考申请，以少年质朴的语言清晰地展现出其民族身份意识与国家责任观念：

当前抗战建国的大时代中，国家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凡是国民，都要负起救国家、救民族的责任，由以青年是国家民族的中坚，是革命的先锋队，更

[1]《(旅汕)台胞意见书》，《台湾义勇队档案》，第737页。

[2]《公函》，《台湾义勇队档案》，第17页。

[3]《台湾义勇队队规》(1941)，《台湾义勇队档案》，第260-262页。

[4]《1945年度编讯组工作计划》，《台湾义勇队档案》，第363页。

[5]《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各项附件宣传纲要》，《台湾义勇队档案》，第7-8页。

[6]《台湾义勇队1943年度工作计划实施办法草案》，《台湾义勇队档案》，第232页。

应负起这个责任。^[1]

在精神层面，台湾义勇队将为祖国抗战而“舍生忘死”的理想作为价值核心。台湾义勇队电令与内部文件中反复强调“舍生取义、死而后已”的革命精神，将“英勇奋斗、义勇迈进”视为人生理想，并将“保卫祖国、收复台湾”定位为全体队员应尽的责任。在队规和训诫中，台湾义勇队更将“上下相爱，缓急相救，至有事之秋欣然而起，慷慨赴义，是诚义勇队之本色，亦即为祖国复兴革命与台湾同胞自由解放之虔诚也”作为其核心理念。^[2]该规训构成了台湾义勇队成员的日常行为纲领，体现出李友邦希望通过制度性规范塑造一种献身国家、服务民族的群体意识。

在此舍生取义的精神感染下，部分台湾义勇队队员先后组成敌后小组、敢死队等，潜入台岛或其他敌占区行动。如有一位于敌占区行动的台湾义勇队干员的陈情电，便是当时台湾义勇队甘愿为国捐躯的内心独白：

吾弃商从军，牺牲一切，于民国三十年（1941）参加台湾义勇队…从军工作茹苦，
备尝为民族关心，虽死犹荣。^[3]

并且，在激发台胞抗战精神时，李友邦还将这种牺牲精神置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宏大背景之下，赋予其国际主义意义。李友邦呼吁全岛台胞：

不辞一切艰苦、不惜任何牺牲，各就自己的岗位为祖国与友邦同心协力、并肩作战，
以尽消灭侵略轴心国所造成的台湾一百八十万人民对此次保卫世界人类文明尽其应尽
之任务…祖国对日寇宣战不但为自己历史上展开新的一页，并且替远东永久和平放了一道曙光，全世界民主国家对轴心之宣战不但给台湾开辟挣脱日寇束缚之机会，并且
为全世界所有的被压迫民众求解放，此乃千载难逢之时机，愿同胞勿忘重任、英勇奋
斗、慷慨牺牲以达台湾革命之目的。^[4]

这种精神图景，不仅体现了台湾义勇队强烈的家国情怀，也进一步将台湾的抵抗与全球反殖民主义、反法西斯的正义事业相连，从而体现出鲜明的国际主义色彩。

在文化层面，台湾义勇队高度重视中华传统文化与历史记忆在台湾的恢复与重建，强调台湾与中国文化血脉、历史命运的一体性。李友邦敏锐地洞察到，日本殖民五十余年“奴化教育”对台湾社会身份认同的侵蚀，故在档案中多次指出台湾义勇队肩负“恢复国有文化、洗涤台胞五十年来所受奴化教育余毒，并唤起其民族意识”的“神圣使命”。对此，宣导组文件多次提出，要“使台胞认识台湾与祖国之密切关系，及祖国历史之悠久、文化之璀璨”、“宣传祖国今日之国际地位”，同时揭露“敌人过去殖民地政策、皇民化运动之内幕及奴化台胞之真相”，^[5]通过大量的理论宣讲与情感动员，重建台湾社会对中华民族文化根脉的情感归属。

具体而言，台湾义勇队在多项对台宣传材料中，将文化认同与民族仇恨、历史记忆紧密相连。例如，一份漫画壁报下附言：“我们是汉民族，不要被臭狗欺骗……咱的仇敌臭狗，在过

[1]《1945少年团投考试卷》，《台湾义勇队档案》，第376页。

[2]《台湾义勇队队规》(1941)，《台湾义勇队档案》，第260-262页。

[3]《陈情》，《台湾义勇队档案》，第14-15页。

[4]《告台湾同胞书》，《台湾义勇队档案》，第145-146页。

[5]《关于宣导部分》，《台湾义勇队档案》，第21-33页。

去五十年间所为的暴虐，给予我等者为何物？政治的压迫、经济的榨取、奴隶的教育，否耶？大家起来，将此恶魔——臭狗驱出台湾！”在唤起反抗意识的同时，台湾义勇队也积极建构正面的民族品格论述，如在讨论不平等条约的影响时，有队员总结：“认识中华民族五千年以来之光荣历史”，“我国固有的民族德行，从历史上看来，是以自尊而不自大、自谦而不自卑的。所谓‘高而远，谦而不卑’，这是我们良好的民族的德行。”通过这种极具情感张力的语言，台湾义勇队将抽象的民族文化、历史记忆与具象的家国情怀牢牢捆绑，使台胞在日常语言与精神实践中不断强化对“祖国”意象的认同。

在进行文化寻根的同时，台湾义勇队亦在国际舆论场上表现出高度的主权警觉，积极捍卫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的政治与法理地位。1942年，美国三大杂志联合发布《太平洋关系》，提出所谓“台湾国际共管论”，虽允许台湾并入中国海关与货币体系，却反对归还中国，主张将台湾纳入国际共管。^[1]台湾义勇队马上予以反击，明确将粉碎“战后台湾由国际共管”之错误论调列为次年度工作计划，通过广播向国际宣扬台湾与祖国不可分之理由，揭露敌人殖民政策之阴险狠毒；并于《台湾先锋》等台湾义勇队出版刊物上，分期从地理、历史、血统、文化上论述台湾与祖国不可分之理由。^[2]

整体来看，李友邦将军与台湾义勇队所体现的家国情怀，是在历史意识、民族认同、革命精神、文化归属等多重层面交织下的产物。这种情怀不仅回应了日本殖民统治下台胞身份认同的危机，也通过实践与话语双重路径重构了台湾社会对祖国、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全面归属。在这一精神图景中，台湾的命运被牢牢嵌入中华民族整体复兴的历史进程之中，进而成为抵抗殖民压迫、反对外来分裂、凝聚民族认同的重要精神坐标。直至今日，李友邦将军和台湾义勇队所承载的这一家国理想，依然构成理解台湾历史归属、认知台湾同胞民族情感结构、推动两岸统一的重要历史参照。

三、台湾义勇队的抗战复土活动

在《李友邦与台湾抗日》一书中，作者根据台湾义勇队的战地出版物如《台湾青年》《台湾先锋》等资料，重点介绍了台湾义勇队医务救助、对敌宣传、武装爆破、农业生产等“技术报国”层面的抗战史实。《台湾义勇队档案》则涵盖了台湾义勇队各方面活动，特别是记录了台湾义勇队为配合全国抗战及收复台湾所做的系统性工作和行动。以下就情报与敌后工作、组织与人才培养、文化与社会工作三个方面，进一步阐述台湾义勇队在抗战后期的重要活动。

（一）情报与敌后工作

自台湾义勇队组建伊始，李友邦便将情报工作确立为队伍的核心任务，充分发挥队员多为台胞的独特优势，有针对性地统筹派遣队员渗透敌占区，系统调查日伪军的军事、政治、经济情况。具体而言，台湾义勇队通常根据干员的自身技能，化装为鸦片贩子、行商和农民等，潜赴敌占区搜集情报。例如，1944年10月福州第二次沦陷后，台湾义勇队队员林竹钧迅速潜赴福州，通过走访群众和贿赂伪军等方式，及时掌握了敌伪在福州的诸多动态。其中有日本人渗

[1] 左双文：《抗战后期中国反对“台湾国际共管论”的一场严正斗争》，《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2期。

[2]《1943年度工作计划实施办法草案》，《台湾义勇队档案》，第230-236页。

透各级机关、借贸易刺探我方情报，伪政权密集设立盐务、财税等部门以强化经济控制，马尾等地增兵、机场设施加紧建设，特务机关密布，社会管控趋严等相当有价值的情报。^[1]

又如，派驻嵛山岛的李文、钱敢先两位工作人员，借助台胞身份与当地伪军高层建立联系，获得了大量一手军政情报。报告中记载：

台湾之壮丁自十八岁至二十一岁，均在征召之列，并自去年起实施；基隆要塞属于海军，宜兰方面并为要塞地带，适日军侵台时之登陆地，澳底及荣（澳）地常均列在内。该处备防严密，任何人均不得进入；台湾被征召之壮丁，每人每天配给食米十两，五分肉，每星期配给四两布，每年配给九尺，全岛渔船均改为海军附属船只……极为恐怖；沪台间川起之航船八百吨以上、五千吨以下者，约有二百艘，专运豆饼、麦、麸粉等由沪赴台，由台运糖来沪，每月运输之货物数量可观。^[2]

报告后面并附有嵛山岛伪军从司令部到各连队的编制与人员名单，极为详尽。

在敌后策反的工作中，台湾义勇队始终坚持以唤醒民族意识的方式“策动被敌征集到前线之台胞反正”。档案记录了队员们成功“以抗建胜利意识及民族教育之熏陶”，策动嵛山岛伪军蔡功部、梧屿伪军张恩禄部反正投诚的例子。后者还衷心表示，“愿以忠诚率领所部报效祖国，以驱赶倭寇、光复河山为意志。”^[3]

另具代表性者，有如台胞林朝（22岁，淡水人）、许水木（18岁，桃园人）二人。其原为台湾通运公司事务员，被台湾总督府海军武官府强征为“建阳丸”水手。1945年4月，该船在南日岛附近遭盟军飞机轰炸，二人趁机逃离，艰难辗转至海沧后被地方当局扣押。台湾义勇队获悉情况后，迅速以台胞身份将二人保释，并对其进行适当训练，使之顺利转化为抗日力量。林、许二人出狱后，出于感化及民族大义，不仅主动为台湾义勇队绘制出台北、淡水、基隆三地要塞驻兵处所的详尽军事地图；还提供了日军在台湾各重要军港的物资调配、海上运输路线及日军防卫部署的相关情报，极大地丰富了台湾义勇队的情报资源。^[4]

整体而言，台湾义勇队的情报与敌后工作，具备大陆其他抗战队伍不具备的优势，即“队员既系台湾人，从日本帝国主义所给我们的奴隶教育之中，学得一点祖国抗战中急迫需要的能力，即如善操日语能读日文及能了解敌国内部情形和敌兵心理。”^[5]作为唯一一支由台湾同胞组成的抗日队伍，其利用身份优势从事的敌后工作不仅是军事能力的展现，更是其家国情怀在最危险、最隐蔽的战线上的英勇实践。

（二）组织与人才培养

台湾义勇队深知“保卫祖国、收复台湾”的使命并非空谈，而必须要建立一支训练有素、能力卓越的抗战队伍。尤其在抗战进入后期，日军在台湾岛及东南沿海的军事布局日趋严密，敌后工作的复杂性与日俱增。台湾义勇队在李友邦领导下，建构了一套包括干部训练、后备人才培养与台湾俘虏转化等多个层次的训练系统，以“服务于整体抗战与收复台湾”的大局。

[1]《福州市谍报》，《台湾义勇队档案》，第783-784页。

[2]《嵛山岛谍报》，《台湾义勇队档案》，第654-681页。

[3]《谍报代电》，《台湾义勇队档案》，第724-727页。

[4]《有关台胞林、许二人反正相关事宜》，《台湾义勇队档案》，第407-417、696页。

[5]李友邦：《台湾同胞！起来！》，《台湾先锋》（合订本）上卷第1期，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4年，第5页。

在干部训练方面，档案记录了台湾义勇队举办的三期干部训练班。其课程分思想教育和军事培养两方面：思想层面，学员每周系统研读世界局势及建国理论，并通过定期举办演讲与论文竞赛等考核方式巩固思想认识；军事层面，除了基本的步兵操典、游击战术与阵地构筑训练外，第二期还增设“台胞组训”、“敌情研究”等专题课程，着重提升学员对实际敌情和特殊情况的应对能力。^[1]同时，为应对抗战后期日益严密的敌方军事部署，台湾义勇队还特设以培养谍报特工人才为目标的“特种技术人员”培训班，以“爱国、日英语流利的两岸青年”为招考目标，训练内容除中国革命史与台湾省史地等文化课外，还包括谍报勤务、密码编制与翻译、侦探学、交通破坏、爆破学及化妆术等特殊技能，^[2]以强化敌后工作的隐蔽性和成功率。

作为长远规划的重要环节，台湾义勇队专门建立了附属少年团，用于培养未来革命与建设事业的后备力量。因为少年团团员年龄普遍在8至15岁，以往的研究多认为其团员通常从事“宣慰军民”等宣传、演出的工作。^[3]然而，正如李友邦批复该团工作月报时指出：“少年团本月份事实工作各种活动缺少普通知识之灌输，应速矫正”，^[4]可见台湾义勇队对其教育质量有更高期待。档案与回忆材料显示，少年团教育内容涵盖国文、历史、地理、数理化、外语等基础学科，并进行台湾战后善后问题的研讨，为未来祖国光复台湾和建设台湾提供参考。^[5]严秀峰女士的回忆亦强调：“少年团团员皆系由敌人血手里逃出来的八九岁至十四五岁的儿童，教育原则为‘工作即学习，学习即工作’。生活上强调紧张、活泼与严肃并重，学习科目除国文、算术、地理、历史外，还专设革命理论课程，如台湾问题、祖国抗战与儿童问题……教学方法注重启发、集体讨论与竞赛，因此三年间，这些原本目不识丁的孩子已能理解‘为什么要抗战、怎样抗战’等基本道理，并以战斗姿态活跃于东南沿海战场。”^[6]由此可见，少年团不仅仅是儿童宣传队，而是台湾义勇队在潜移默化中为台湾未来的政治、军事与文化重建培养的种子力量。

此外，台湾义勇队亦重视对台湾俘虏的教育与转化。抗战后期，大量台胞被日军强征参与前线劳务或军事行动，被俘的台湾俘虏成为台湾义勇队争取和转化的重点对象。台湾义勇队为此制定了《特种台籍俘虏教育实施办法》，明确规定使俘虏“认识保卫祖国收复台湾之真谛，矫正倭化之生活行动习惯”。通过精神教育（“礼义廉耻德性之熏陶”）、生活教育（“洗刷奴化生活习惯”）、行动教育（“集体行动之养成”）、智能教育（“中国国有文化之灌输”）、军事教育（“智仁勇严之武德”），逐步消除其在日本殖民统治下所形成的奴化思想，成功转化为抗战力量。^[7]同时，为持续壮大组织力量，台湾义勇队采取公开招募与秘密吸纳并行的策略。公开招募方面，其长期在福建、广东等地公开招募通晓闽南语、有志复台的两岸青年；秘密吸纳方面，台湾义勇队在龙溪、福州、广州、汕头、上海等敌占区及邻近地区设立秘密的“敌后台胞招致机构”，以绝对秘密的方式接待、保护并吸收来自敌后的台胞加入组织。例如，台湾义勇队队员李明法在上海工作期间，成功争取到台湾文艺联盟重要成员、台北市民选议员张维贤，后者表示愿“以

[1]《第二期干部训练班训练计划纲要及实施细则》，《台湾义勇队档案》，第809-824页。

[2]《台湾义勇总队特种技术人员训练办法》，《台湾义勇队档案》，第47-48页。

[3]陈小冲：《台湾少年团述论》，《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4期。

[4]《少年团一月份工作月报》，《台湾义勇队档案》，第141-142页。

[5]《义勇队少年团1944年度工作计划大纲（1944年1月订）》，《台湾义勇队档案》，第990-992页。

[6]严秀峰：《抗战时期的台湾义勇总队》（下），台湾《中外杂志》1982年第6、7月号。

[7]《台湾义勇总队特种台籍俘虏教育实施办法》，《台湾义勇队档案》，第49-50页。

忠诚为祖国效劳献身”。^[1]

通过系统且有针对性的队员培养与招募，台湾义勇队成功地塑造出一支思想坚定、技能娴熟且适应敌前、敌后环境的台胞抗战队伍，为抗战后期整体反攻及收复台湾后的重建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 文化与社会工作

受文献材料所限，以往关于台湾义勇队抗战工作的研究多集中于其对敌政治、医务诊疗以及宣慰军民等方面的贡献。^[2]而《台湾义勇队档案》显示，台湾义勇队在台湾光复前后还进行了诸如“复土”措施及文化研究、台胞社会救济以及台湾接收初期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首先，台湾义勇队在台湾光复前夕便已为光复并接管台湾做规划与准备。在台湾义勇队《1945年度工作计划实施办法》中，明确提出工作重心为“组训建设台湾人才，提供建设台湾资料”，并组织成立“台湾复土建设研究委员会”，其研究范围包括台湾省的“史地（包括详细地形）、风俗人情、工业、农业、商业、金融、矿产、水产、土地、人民生活、社会情形、地方政情（包括保甲）、交通、文化教育、日寇统治下之单行法规及政策、复土前之准备、复土后之设施”。^[3]同时，台湾义勇队将“文化消毒”作为台湾光复后的核心任务之一，计划在收复台湾后立即开办“民众学校”，教授国语、中国史、台湾革命史等课程，“以提高民众之民族国家观念”。^[4]并且，台湾义勇队还着手组织接收台湾报社及青年馆、印刷所、医院、学校等设施，以维持台湾光复后的社会运转。

其次，台湾义勇队着手规划在收复区域对台胞群体的社会救济和文化重建。由于日本侵占台湾50年，部分台胞又被迫参加日军队伍，参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军事行动，由此闽台两地民众产生了一定程度的隔阂，日本投降后散居福建省的台胞处境尴尬。^[5]因而，台湾义勇队于1945年10月派员进入厦门岛、鼓浪屿等地，对当地约7500名台胞进行全面的慰问和调查。其调查报告详细记录了战后台胞面临的财产被劫、逼迁、失业，以及因“汉奸”问题而遭受歧视等困境，并汇总了台胞请求政府保护财产、解决纠纷、介绍工作、设立台胞子弟学校等具体诉求。调查结果显示，“台胞除一部分富商外，大部分失业、生活窘迫，仅有维持数月之粮，其甚者业已断粮”，“在厦台胞因良莠不齐，一般善良商人亦同时受到歧视”，^[6]为台胞安置和管理提供有效参考。同时，台湾义勇队的调查结果亦显示即便存在两岸隔阂，台胞亦对祖国抱有向心。如何引导广大台湾同胞脱离日本侵略者的文化统治，唤起台湾同胞的民族自尊心，成为台湾义勇队先遣队的重要工作之一。先遣队队长张士德在一份《台湾工作近况》中记录了这样一件激动人心的事实：

日本投降后，台北第三高等女子学校举行结束典礼，席上，该校校长（日人）首谓：“你们从今天起，之后为‘支那人’了”。有一女生毅然起曰：“你说错了！我等

[1]《1945年度工作报告》，《台湾义勇队档案》，第454-460页。

[2]陈支平主编，王日根、苏惠萍著：《台湾通史》（第五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42-246页。

[3]《台湾义勇队复土建设研究委员会简则》，《台湾义勇队档案》，第796页。

[4]《台湾义勇总队附设民众学校暨民众指导处理办法》，《台湾义勇队档案》，第41-42页。

[5]陈佩云：《福建视域下光复初期的台湾（1945-1949）》，博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2022年，第42-43页。

[6]《台湾义勇总队慰问调查全厦鼓台胞工作总报告》，《台湾义勇队档案》，第749-763页。

不是支那人，我们是大中华民国的国民！”该校长哑口无言，潸然泪下，良久，只曰：“五十一年间的日本教育，已付之东流矣。”就为之一快。^[1]

此类事例表明，即便在长期殖民压迫与两岸隔阂的情况下，台湾民众依旧未失民族认同。在台湾义勇队的细致工作之下，广大台湾同胞的民族自强意识迅速得到恢复和提升。

最后，台湾义勇队在台湾光复初期还主动承担了维持地方秩序的社会工作。作为一支由台胞组成的抗日队伍，第一批台湾义勇队队员于1945年12月8日率先抵达台北，与岛内革命同志会合，维持地方治安，并协助国民政府进行接收台湾后的行政管理。^[2]虽然台岛同胞均在日本投降后欢欣若狂、庆祝光复，但依旧有少数台胞执迷不悟，受日本军官利用，暗中进行破坏。先期到达的台湾义勇队队员，开展各方面富有针对性的工作，为光复后的台湾社会秩序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据张士德报告，第一批返台的台湾义勇队队员积极反击少数亲日派在战后试图推动“台湾独立”以“保持日人在台之财产”、“维持以往之优越地位”的图谋，并通过多方解释、以大义激发民族意识等方式，成功化解了日本士兵及“台湾浪人”组织的暗杀团针对国民政府高层官员及积极迎接光复的台湾知名人士的威胁。^[3]

综上，虽然台湾义勇队与少年团于1946年初被宣布解散，但其在抗战与光复阶段所发挥的组织动员、教育培养与社会服务功能，对抗战胜利后台湾的接收与重建进程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战时台胞自主组织的抗日力量，台湾义勇队不仅参与敌后作战与情报任务，也主动投入战后社会研究、教育与秩序维稳，展现出高度的家国情怀与实践能力。尽管其组织未能延续，但所承载的精神价值与历史意义，仍值得后人铭记。

结语

以往关于台湾义勇队的研究，多以其敌后武装行动、对敌政治工作、医疗救助等为重点。《台湾义勇队档案》则较为全面地呈现出台湾义勇队情报策反、干部培养、社会工作以及文化重建等多面向的系统性抗战活动，体现了台湾义勇队为民族自觉和民族解放所作的不朽贡献。台湾义勇队明确表达的“祖国”、“同胞”、“汉民族”等身份认同，以及主动规划台湾战后社会复兴与文化建设的实际行动，有力驳斥了当下“台独史观”对台湾抗日历史的刻意扭曲与割裂论述。

近年来，部分“台独”分子为否定两岸之间天然的历史文化联结，蓄意将台湾抗日运动污蔑为“殖民现代化”的副产品，甚至将台胞的抗日运动歪曲为寻求脱离祖国的分离主义运动。然而，档案中的历史事实表明，台湾义勇队明确以台湾回归祖国为最终目标，并在各个层面展现出深厚的中华民族认同与祖国统一的家国情怀。更为重要的是，台湾义勇队在国际舆论场上对“台湾国际共管论”的坚决抵制，更凸显其坚定的主权观念与反殖民立场。因此，台湾义勇队的历史遗产不仅是一份抗日斗争的英雄事迹，更为认清“台独史观”本质、坚守台湾历史真相与两岸共同记忆，提供了鲜明而有力的历史见证。

(责任编辑 刘佳雁)

[1]《台湾工作近况》，《台湾义勇队档案》，第740-748页。

[2]严秀峰：《跨越海峡的情怀——一名女战士的自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32页。

[3]《台湾工作近况》，《台湾义勇队档案》，第740-748页。

A Re-examination of Taiwan Volunteers' Patriotic Sentiment and Struggl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for the Restoration of Taiwan

Chen Zhiping & Chen Boyuan

Abstract: Based on the existing archives of the Taiwan Volunteers and other related historical records, this article re-examines the patriotic sentiment and wartime contributions of the Taiwan Volunteers. The archives reveal that such patriotic sentiment was deeply rooted in a strong sense of historical, ethnic, spiritual, and cultural identity, with its enduring objective being “to defend the motherland and recover Taiwan.” The documents also demonstrate the Taiwan Volunteers’ systematic contributions to the war of total resistance by the whole nation, which extended far beyond guerrilla operations behind enemy lines to include intelligence work, subversion from within the enemies,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talent cultivation, as well as cultural and social activities. These multifaceted efforts played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achieving victory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nd the recovery of Taiwan. The history of the Taiwan Volunteers during the wartime reflects the close ties and shared national identity between Taiwan compatriots and other members of the Chinese nation. It effectively refutes the so-called “Taiwan independence historiography” that seeks to sever cross-Strait historical ties, and provides important evidence for understanding that Taiwan has always been an integral part of China.

Key Words: Taiwan Volunteers; Li You-pang; “Taiwan Independence Historiography”